

道德文章永存

記蔣禮鴻先生

梁曉虹



蔣禮鴻先生(1916年2月9日—1995年5月9日)，字雲從，浙江嘉興人。出身城市貧民之家，少年就讀於嘉興教會學校秀州中學，畢業後經保送，入教會大學杭州之江文理學院(後改爲之江大學)國文系學習，受業於夏承燾、鍾泰諸師。畢業後留校任助教，後又任教於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、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和文學院中文系、浙江師範學院中文系、杭州大學中文系。

先生治學嚴謹，強調重視第一手材料，無徵不信，徵實不誣；不囿己見，旁收兼蓄。通文字、訓詁、音韻、目錄、校勘之學，尤擅長俗語詞研究、古書校勘和辭書編纂，著述宏富。除代表作《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外，尚有《義府續貂》、《懷任齋文集》、《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著》、《古漢語通論》(與任銘善合著)、《目錄學與工具書》等。

先生從事教育共五十七年，教書育人，不遺餘力。由他培養出來的一批碩士、博士和大批科研、教學骨幹亦積極活躍在各地科研和教育的第一線。

二

蔣先生畢生從事於學術研究，他對學術的貢獻是多方面的。

首先，他繼承和發揚了清儒乾嘉學派的學風，除了嚴謹的治學態度以外，在理論上，他對乾嘉學派的學說亦把握至深，解決了不少難題。先生還同時借鑒現代語言學理論，融古今語言學理論於一體。在方法上，他將訓詁學與校勘、文字、音韻結合起

來，在古籍整理、詞語考釋、辭書編纂等許多方面，都取得了成果。先生有關訓詁的論著很多，著名的《商君書錐指》還是先生未滿而立之年的力作。此書博採嚴萬里、錢熙祚、俞樾、孫詒讓、陶鴻慶、朱師轍諸家的校釋成果，廣參《藝文類聚》、《羣書治要》、《意林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路史》、《圖書集成》諸書引文，而後下己意以論定之，於校詁兩端皆多發明。此書於1944年獲得了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學術著作三等獎（當時楊樹達、聞一多獲二等獎，一等獎缺）。有一位專家在審查報告中對此書評價甚高，「本著作參採訂證今昔諸家之說，並下己義整理古籍，頗稱賅備。議論每有獨到之處。而允當樸實，一洗穿鑿之弊，尤為難能可貴。《商君書》殆當推此為善本矣。」先生亦以此書而獲升為大學講師。四十多年後，此書又被中華書局列入《新編諸子集成》第一輯出版。

《義府續紹》則是先生又一部重要的訓詁著作。此書以考索詞義、詞源為主要內容，屬於筆記性著作。因清人黃生寫過一本《義府》，故名之為《義府續紹》。全書以王念孫「義存於聲，聲近義通，求之於聲則得，求之於文則惑」之語為指導思想，「論述通假，探索語言，尋核俗語，皆審諦」、「窮極研几，後出轉精」、「嚴於律令，具有條理，不失為小學家之言」、「即以校勘言之，亦考核至慎，多有可取」（徐復《讀〈義府續紹〉識語》）。《義府續紹》由中華書局印行出版後，訓詁學家視為珍品，臺灣學者對此書評價亦高。

另外，先生還將校勘和訓詁結合起來，在古籍整理和詞語考釋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，有《〈廣雅疏證〉補義》、《說「弗吊、不吊、不淑」》、《杜詩釋詞》、《〈敦煌資料〉詞釋》、《讀〈同源字論〉後記》、《淮南子校記》、《讀〈論衡校釋〉》、《讀〈論衡集解〉》、《讀〈韓非子集解〉》、《大鶴山人校本〈清真詞〉箋記》、《〈梨園按試樂府新聲〉校記》、《校勘略說》、《誤校七例》等精彩論文。

從1958年開始修訂《辭海》起，先生即自始至終參加了語詞部分的修訂工作。1978年，《辭海》編委會恢復，先生任語詞部分的分科主編。1977年，《漢語大詞典》編寫工作開始，先生應邀參加，並擔任副主編。在長期的辭書編纂實踐中，先生先後寫下了《辭書三議》、《辭書釋義二題》、《辭書不宜「本字」說》、《懸斷與徵實》、《說「通」》、《論辭書的書證與體現詞匯源流的問題》等論文，對辭書的編纂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意見。在《辭書三議》中，先生提出了編纂《漢語大詞典》，要做到會通、逸義、辯證三點，呂叔湘看後曾給先生去信，謂「此文所提三點，實大詞典成敗所繫」。

先生長期從事古漢語教學實踐，與好友任銘善合著了《古漢語通論》，從文字形義到詞匯，以及語法中有別於現代漢語中的部分，乃至句逗、古代文學作品修辭、古書疑義、目錄學常識等都有論及，內容廣泛，有許多地方都包含了先生的獨到見解，是諸種古漢語教材中頗有特色的一本。

先生文學修養極高，善爲詩詞，他與夫人盛靜霞從年輕時起就常常用舊體詩詞唱和作答，表達深摯的愛情，在朋友中傳爲美談。另外，先生還有專門討論與文學作品有關的單篇文章，題名《咬文嚼字》，1982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。一些文學界著名學者的作品，如王季思校註《西廂記》、鄧廣銘《稼軒詞編年箋註》、徐朔方校註的《牡丹亭》和編校的《湯顯祖集》，都吸收了先生的意見。

最能體現先生學術精神的是著名的《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。此書初版於1959年，五萬七千字，考釋變文中多有詭異難解的俗字僻詞，解決了敦煌變文閱讀中的諸多困難，爲敦煌學的研究者搭起了一架天梯。但先生不以此爲滿足，他又不斷探索，不斷增訂，1960年再版，增爲十一萬二千字。1962年出第三版，續添爲十五萬九千字。1981年第四版行世，則已猛增到三十一萬五千字。1988年又第四次增訂，字數擴充到四十萬五千。三十年間，共出五版，篇幅擴大了七、八倍，這在學術著作中實在是罕見的。另外，1975年、1982年，臺灣臺北的古亭書屋、木鐸出版社也曾兩次翻印，足可見此書之受歡迎了。

郭在貽曾撰文論述《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的四點特色：一、從材料上看，有意識地使用了各式各樣的語言材料，這就爲解決變文中的疑難詞語提供了較大的可能性。就時間斷限而言，上起先秦，下至現代。就材料的內容而言，舉凡詩、詞、曲、賦、筆記、小說、語錄、隨筆、民謠、佛經、詔令、奏狀、碑文、字書、韻書、音書、史書、文集等等，無不在採摭之列。在材料的採摭和使用上，《通釋》實有突過前人之處。二、在方法上，除體會聲韻、審辨字形、玩繹章法、揣摩情節、比照意義諸端而外，更爲重要的是，《通釋》能發揚清代樸學家以聲韻通訓詁的優良傳統，有意識地從語言的角度來探索詞義、詞源，不少難度較大、「求諸聲則得，求諸文則惑」的問題，因此而得到解決。而這是以往一些研究俗語詞的作者所欠缺的。三、運用歷史發展的觀點研究語言現象，它並不滿足於對變文中的疑難語詞作獨立的、靜態的詮解，還力求找出它們的來龍去脈，進而把語詞的斷代研究納入詞匯史和語言學史的範疇，爲漢語詞匯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。四、在考釋變文詞義的同時，還能聯繫其他許多古代典籍，連帶解決了這些書中的不少訓詁與校勘問題，因而它不僅是一部研究敦煌變文的工具書，也是閱讀和註釋其他一些古書，特別是古代詩文必不可少的工具書（《讀新版〈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〉》，《訓詁叢稿》頁139—148）。

《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問世後，呂叔湘曾在一篇總結語言學情況的文章中提到，需要像《詩詞曲語辭匯釋》、《金元戲曲方言考》、《元劇方言俗語例釋》和先生這本書那樣的作品幾十部，才能編纂《漢語大詞典》。其他著名學者如周一良、周祖謨、洪誠、徐復、王貞珉、張永言等亦有好評。此書在國外也引起了極大轟動，研究漢語、佛學、敦煌學、中國俗文學等東方文化的學者紛紛讚譽，如英國的漢學家 Arthur Waley 和前蘇聯的漢學家孟什科夫、日本著名禪學家柳田聖山等曾在各自的論著、

論文中多有稱引。日本東洋大學教授波多野太郎對《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非常重視，曾在《橫濱市立大學論叢》等刊物上撰文推薦，譽為研究中國通俗小說的指路明燈。後又於《諸錄俗語解》之「提要」中專門提到：「最近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出版的蔣禮鴻教授寫的《增訂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，可以說是大著，裨益中外學者很大。」美國從事敦煌語言學研究的梅維恆曾說：「在我所從事的工作中，對我幫助最大的要算兩本書，一個人。兩本書是日本的《敦煌變文集口語語匯索引》和中國的《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。一個人是中國的蔣禮鴻先生。」

《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自 1959 年出版，行世三十六年，1992 年 11 月 1 日，榮獲第二屆吳玉章一等獎。這是代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最高榮譽獎，先生一輩子的辛勤勞動終於得到了社會的承認。

三

蔣先生一生嗜書如命，從來都是書不離手，無論在家，還是在外，連在住院中，也都是每天手不釋卷。杭州大學為紀念蔣禮鴻先生，特編集出版了題名為《書魂》的紀念文集，書中自有恩師魂，這是再好不過的名字了。

先生一生淡泊名利，生活簡樸。他的臥室兼書房，傢俱簡樸而陳舊，牆上貼著他親手書寫的條幅，一幅是「心底無私天地寬」，一幅是「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無欲則剛」。這是先生的座右銘，也是他一生無私無欲、淡泊名利、無所索求、只有奉獻的最好註腳。